

## 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全球经济复苏和就业的重要催化剂

发达经济体的持续疲软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构成了威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不足以维持其最近的增长途径。一段时间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全球经济的引擎，但在北方传统市场需求不能复苏的情况下，这种脱钩的努力正在失去动力。在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财政紧缩虽然到目前为止显然未能奏效，但却被视为在中长期内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导致近期和中期全球经济前景黯淡的因素并不会自动使长期前景好转。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短期前景越黯淡，对未来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其他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的负面溢出效应也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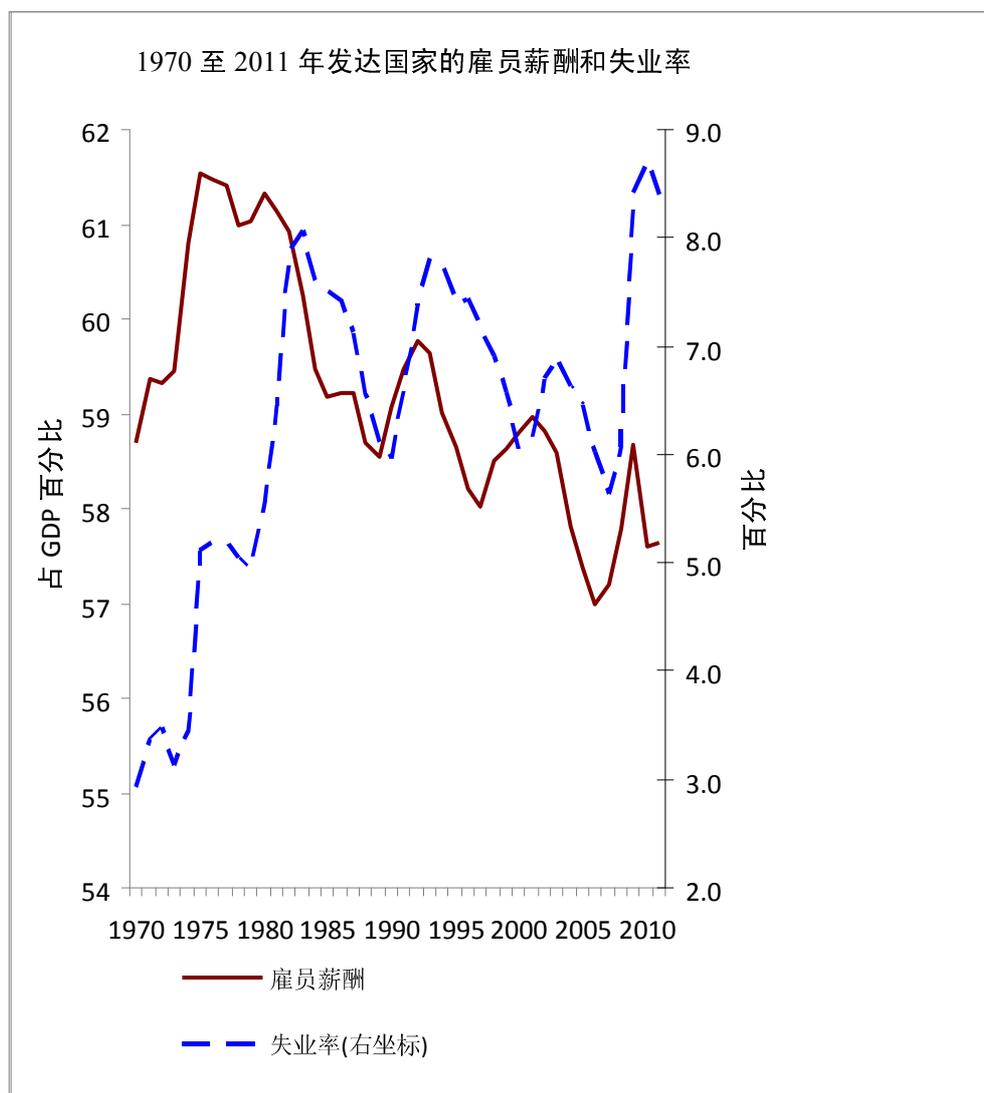
在货币政策已用尽且部署财政政策刺激增长面临政治障碍的情况下，需要新的分析和新的工具来打破僵局。贸发会议在 201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认为，目前的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要工业化经济体劳动力市场失灵造成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工资却偏低。私人家庭面临高失业率和工资下降的压力，无法增加消费；虽然公司拥有高额利润和大量现金，但鉴于开工率低，加之前景黯淡，不愿增加投资。由于失业率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达到了最低点，因此，利用“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振兴疲软经济的普遍信条已不足为信，各国政府应转而制定积极的收入政策。

### 收入预期下降抑制内需

工资压缩和实际工资增长率落后于生产率增益，是过去三十年来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少数人的巨额薪酬作为利润增长和不平等加剧这一总体趋势的一部分，并未像经济学理论说明的那样带来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固定资本投资。在从 1980 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 5 个百分点或更多。在一些主要经济体，这相当于直接推翻了战后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契约和共识，这种契约和共识基于以下观点：实际工资将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上升，从而维持私人家庭的国内需求。

因此，根据几十年来在经济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失业率急剧上升和低工资或工资下降本不应同时发生。但是，2008 年和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情况恰恰如此。发达经济体的工资已经降至六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失业率却已升至 9%这一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高(见图 1)。

图 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基于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库；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

说明：发达国家不包括东欧国家。雇员薪酬以占按要素成本计算的 GDP 的百分比计算。由于 1991 年德国统一，当年数据出现了一个间断。

以美国为例，该国工资增长多年来一直落后于生产率增长，但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失业率急剧上升，上升幅度至少相当于前几次衰退，而且高失业率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持久。但是，如果在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幅落后于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下失业率仍大幅上升，那么降低工资能够引发对劳动力需求的简单市场关联就不适用了。实际上，高失业率正在给工资造成压力，但低工资正在导致进一步削减就业，因为更低的工资压缩了消费和最终需求。任由高失业率造成的压力进

一步压缩工资将会产生反作用，因为名义工资下降的直接影响就是私人家庭需求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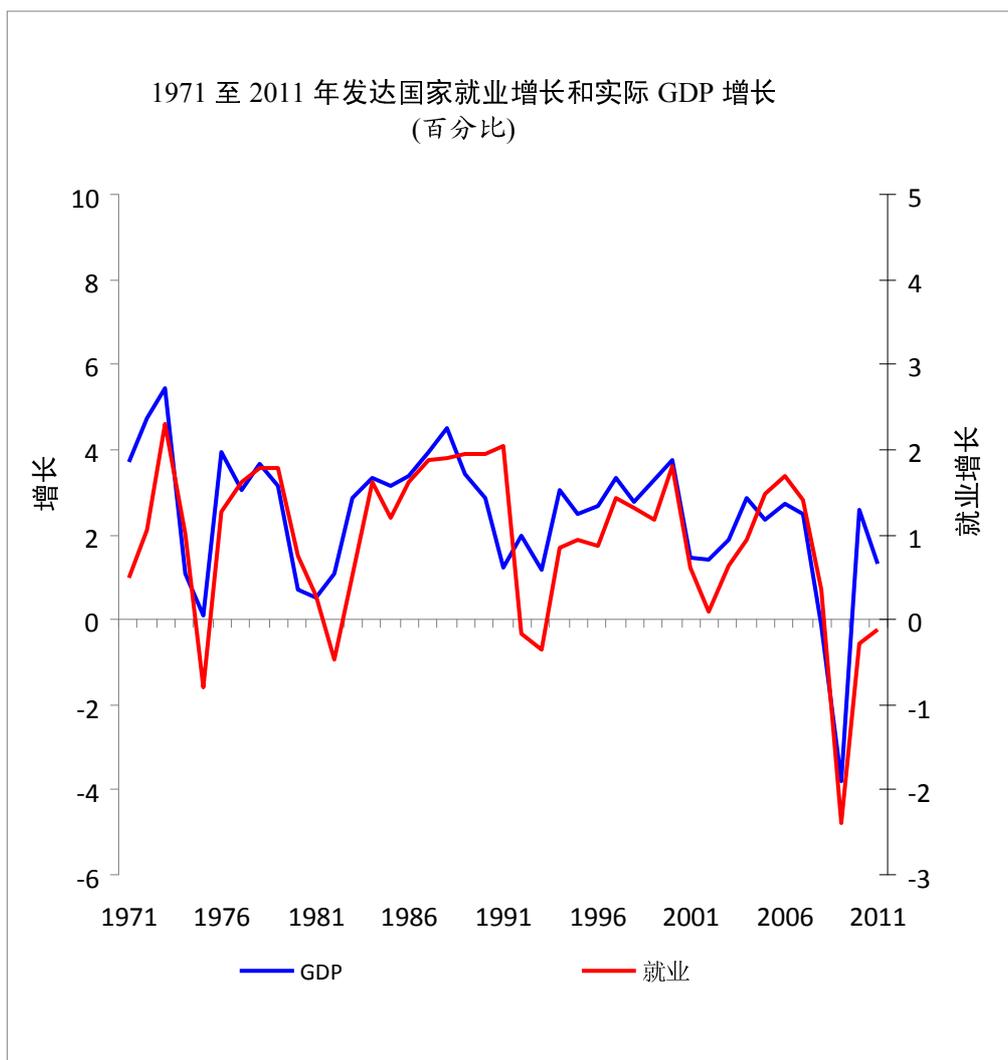
关键在于事件的顺序：工资降低的过程中，在资本换取劳动等任何积极影响发生之前，国内需求会明显下降。如果需求首先下降并降低了生产能力利用，甚至利润也不会因收入降低而上升。只有政府应用刺激需求措施才能弥补“灵活工资”造成的源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降低。

奇怪的是，虽然政府屡次扮演最后的银行家的角色，但很多政府却不仅拒绝扮演最后的雇主的角色，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建议削减工资总额或设置工资总额上限。危机爆发以来，贸发会议就曾警告说，就业机会创造与财政紧缩是相互对立的。这一观点近来得到了包括儿童基金会(2012年)在内的多方的支持，儿童基金会担心，世界各国政府正在讨论的紧缩措施将延迟劳动力市场复苏并加剧经济危机的巨额人力成本。儿童基金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的审议显示，2010年至2012年期间，7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考虑削减工资总额或设置工资总额上限。与此同时，133个国家预期将削减公共开支，这将进一步对就业和工资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

这种措施往往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有关。但是，竞争力是一个适用于公司一级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相对概念。虽然所有国家都可以提高生产率并提高居民收入，但各方试图通过削减相对于国家生产率的工资水平提高竞争力的做法只会导致普遍贫困——真正的逐底竞争。

遗憾的是，全球经济决策尚未吸取这一教训。贸发会议在《201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和《第24号政策简报》(2011年)中警告说，在面对非常脆弱的经济环境实行财政紧缩的情况下，不应对于私营部门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反弹能力持过于乐观的看法。最近的一系列的GDP预测大幅下调以及再度陷入全球衰退的前景证明，一些构想，如紧缩的“非凯恩斯效应”等，属于不切合实际的空想，而不是合理的理论和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就就业增长而言，有关证据表明，它与总体收入增长密切相关，还表明，固定资本总额的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也存在关联(UNCTAD, 2012; 并见图2)。在现实世界里，劳动力和资本可互相补充，却不能互相替代。需求增加时，公司同时投资于劳动力和资本，而需求下降时，公司则同时从二者中撤资。

图 2: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基于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库；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以及统计局的日本历史统计。

说明： 发达国家不包括东欧国家。

这一证据明确地反驳了如果劳动力市场足够灵活则无论增长率高高低都能实现高就业率的常规论点。但是，当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将意味着较低的工资和总体需求——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将进一步破坏经济稳定。它将引起更严重的衰退，并导致就业减少并给工资带来新的压力。将需求排除在企业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意味着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失败。同样，当 1982 年至 2005 年期间公司税下降时，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并未上升，而是有所下降。拥有高额利润和资本但面临需求不足状况的公司不会扩大其生产和创造就业活动。

## 重新平衡和扩大需求，包括通过工资和劳动力市场政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将重新平衡收入分配作为一个首要政策目标。增长如果不能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做到公平，或者导致少数幸运者获得极高报酬而多数人(所谓的 99%)获得很低报酬，就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工薪家庭是最重要的消费者，而私人消费是可持续性内需的核心组成部分；不能使这些家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扶持就业、促进增长的工资政策不可或缺。如果劳动力市场力量均衡不公平，就需要将收入政策作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补充。这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只有社会各部分均有机会受益于改善的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才能对整个经济起到有益作用。

### 有关政策原则包括：

- 政府应抵制“灵活劳动力市场”的普遍信条，转而制定积极的收入政策。
- 需要规定名义工资增长率应等同于平均生产率加政府或中央银行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
- 集体谈判机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辅之以工资调整的政府建议或一般指导原则，如最低工资。
- 还可用其他途径来修正市场的表现，包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征收累进税。
- 旨在改善必需品和服务供应的公共支出也可通过提供再分配的辅助渠道发挥作用。

详见 UNCTAD, 2012。

### 参考资料：

UNCTAD (2012).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Policies for Inclusive and Balanced Growth.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2.II.D.6. New York and Geneva.

UNICEF (2012). A Recovery for All: Rethinking Socio-Economic Policies for Children and Poor Households. Ortiz I and Cummins M, ed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New York. ISBN: 978-1-105-58755-9

### 要点

- 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达到二战以来最低水平，而失业率则达到最高水平。

- 工薪家庭是经济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但由于面临压力，它们无法增加消费以支持经济复苏。
  - 政府应抵制“灵活劳动力市场”的普遍信条，转而制定积极的收入政策。
  - 各国试图通过削减相对于生产率的工资水平提高竞争力的做法只会导致普遍贫困——真正的逐底竞争。
-